

中国文化心理学丛书

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

汪凤炎  
著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 A NEW LOOK

下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报·孝·情结·崇拜·迷信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文化心理学丛书

# 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

汪凤炎  
著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 A NEW LOOK

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31971014）资助项目
-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心理学）建设工程三期项目（2018-2020）成果
- 上海市“十三五”重点图书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 下 / 汪凤炎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12

(中国文化心理学丛书)

ISBN 978-7-5444-9713-8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国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00323号



责任编辑 王佳悦

封面设计 郑艺

中国文化心理学丛书

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下)

汪凤炎 著

---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http://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640 1/16 印张 30.75 插页 4

字 数 425千字

印 数 1-2,000本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9713-8/B·0172

定 价 158.00元

---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 作者简介

---

汪凤炎，1970年3月生。心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兼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校学术委员会、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大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主攻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智慧心理学。现主持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2019年成功申请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独著和第一作者身份出版著作8部，主编教材3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各专著总计获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次（第六届和第七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第十一届和第十三届），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三等奖与中国图书奖等。2011年和2018年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期和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2019年7月获南京师范大学“奕熙精英教师奖”。

# 丛书总序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许多心理是通过自然进化而来的。而文化心理学(广义的,包括跨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又表明,人的一些心理是在文化中生成的。合言之,人心是自然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以文化生成人心为例,现有研究已表明,文化对人的影响至少表现在四个层次上:(1)文化对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observable artifacts)的影响,如不同文化里人们的建筑、服饰、饮食、语言(文字)等各不相同;(2)文化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行为方式有差异;(3)文化对制度(含习俗)的影响,不同文化下人们建构出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习俗;(4)文化对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values)、思维方式和潜在假设(underlying assumptions)等的影响,这种影响虽往往是无意识的,却是文化影响的最高层次,决定着人们的知觉、思维过程、情感、价值观乃至行为方式(侯玉波,朱滢,2002)。所以,据《晏子春秋》卷六《内篇杂下·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 晏子对以橘第十》记载,晏子曾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汤化,2011,p. 403)从文化心理学角度看,这段话形象地阐明了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影响。

既然人心是自然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那么,人的心理至少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机制:一是心理的自然机制,主要包括心理的生理机制和心理的普适性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等内容。它主要通过生物进化形成,具有较大的文化普适性(cultural universality),不同文化中的人的

心理多具有相似的自然机制。二是心理的文化机制,主要包括人的社会心理机制(如自我、品德或价值观与人格等)和审美心理机制等内容。它主要通过文化积淀慢慢形成,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性,不同的文化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同时,人的心理既有事实(如心理的客观规律)或客观的一面,也有价值(如价值观与理想人格等)或主观的一面。心理的自然机制和心理的事实层面主要依靠生理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等路径寻求解决,心理的文化机制和心理的价值层面主要依靠文化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等路径寻求解决。例如,欧美国家的民众(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华裔除外)少有恋家情结,也不看重孝道,但欧美国家的民众多有信仰基督教的传统,美国甚至还在其目前流通的纸币背面印上“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一语。与欧美人不同,多数中国人虽无基督教信仰(甚至无任何宗教信仰),但自古至今都有浓厚的恋家情结,而且看重孝道。中国人与欧美人之间存在的这种心理和行为上的差异,必须通过文化心理学的路径来解释才妥当(汪凤炎,郑红,2015b, pp. 1-3)。

正由于人的心理既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机制,又兼有事实与价值,这使得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兼具自然性(如生物性)和人文社会性,所以,心理学本是一门兼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中间科学(潘菽,1987, pp. 176-178)。与此相吻合,当今世界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明显趋势:一是向脑内发展,想方设法打开大脑这个“黑箱子”。概括地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研究仪器得到不断改进,大量高、精、尖仪器不断被制造出来。这些仪器的出现,又促进了眼动仪、事件相关电位(ERP)、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术的不断成熟,为心理学研究者逐步揭开大脑这个“黑箱子”提供了技术支持。进入21世纪后,认知神经科学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越来越多具备生理学、生物学、医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心理学者汇聚一堂,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探索心理的生理机制问题。二是向脑外发展,千方百计解开弥漫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之中的“文化谜团”。简要地说,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人们往来世界各地变

得越来越便捷,整个地球变成“地球村”。在“地球村”的背景下,不同文化圈间的人际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人们掌握一定的文化心理学知识,以便自己能更方便、更妥当地与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不至于因不熟悉对方的文化心理而“犯忌”。正由于此,越来越多具备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心理学者汇聚一堂,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探索心理的文化机制问题。

对中国心理学而言,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中国历史悠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要科学揭示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丰富内涵,要充分发挥中国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都必须加强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同时,不但汉字里蕴含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专门的研究方法——汪氏语义分析法),而且中国历代都有一些学人对人心问题进行过深入、系统的探讨,提出过大量至今看来仍有见地的心理学思想。这样,若舍弃小科学观和小心理学观,秉持大科学观和大心理学观(汪凤炎,2008, pp. 26 - 31),一方面,可以化解“艾氏紧箍咒”——艾宾浩斯(H. Ebbinghaus)声称的“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E. G. 波林,1981, p. ii)——给中国文化心理学带来的障碍(汪凤炎,2014a);另一方面,以此来观照中国文化,可以发现中国人创造了厚重的心理学这一事实。而且,由于这些心理学思想是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和累积起来的,不仅时间跨度大,覆盖了中国人心理特质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全部时间,更重要的是,它是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中土生土长的心理学,符合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和思维习惯,能真正反映中国人心理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而且它自成体系,有自己的范畴、理论和概念等,其中虽然有些内容反映了人类心理的共性,但也

有一些内容明显区别于西方心理学思想。这些心理学思想最能反映出中国文化因素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因此,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它们,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已具备了解人类心理的方法、解释人类心理的理论和影响人类心理的手段(葛鲁嘉,1995, p. 266;汪凤炎,1996)。从“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这一角度看(罗竹风,1997, p. 4749),可以将其命名为中国文化心理学,以此区别于其他文化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心理学,特别是在西方文化里发展起来的心理学。

这样,当代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在研究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若能同时兼顾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两个研究视角,便是从纵贯的历史观点来研究当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最好手段,并且能纵观各个历史阶段内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间的具体关系(杨国枢,1993)。而且,这样做最易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心理的同与异,从而有利于研究者根据中国国情来修改外国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或创立新的理论,这不但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而不是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之义)的有效途径之一,不但能增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民族自信心,不但有利于培养融会中外心理学思想之长的心理学研究者,不但有助于心理学更加贴近日常生活进而增强心理学的生命力(汪凤炎,郑红,2015b, pp. 1-12),而且能帮助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心理学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正如美国跨文化心理学家特安迪斯(H. C. Triandis)所说:

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在新的背景下重新审察心理学的成果。在这样做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应该告诉西方的同行,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万明钢,1996, p. 7)

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有如此多的重要意义,而现在又恰逢国家重视中国文化建设的良机。在此大背景下,我们计划组织国内一批

有志于推动中国文化心理学发展的学者,撰写并出版国内首套(可能也是世界首套)以“中国文化心理学”为名的系列图书,以期推动“新体新用”式中国特色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新体”指通过诠释、转换和创新,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精髓与西方心理学和苏俄心理学的精髓融会贯通起来,从而产生融合中西心理学精髓的心理学新学科体系,就如历史上的中国学人将中国儒家文化的精义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的精义相通,从而生成宋明理学这个新知识体系一般。“新用”指会产生新的功用,也就是说,中国学人一旦建立起这种心理学的新学科体系,必能在推动世界心理学又好又快发展和增进中国人乃至人类的幸福生活等方面有一番新的作为(汪凤炎,郑红,2015b,p.2)。

整套丛书主要包括三种研究类型:一是“以发现、梳理与诠释为主型”。它指先寻找并发现中国先贤提出的心理学精义思想(一般蕴含在先贤创造的实物文化与制度文化里),通过细致梳理,尽量用现代心理学的学术规范与术语(也适当保留一些原汁原味的概念)加以诠释,使之得到更好的传承。这类论著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文化心理学中“有什么”;其目的主要是摸清家底,看看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到底蕴含哪些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心理学思想(汪凤炎,郑红,2011,pp.30-31)。二是“以建构或创新为主型”。它指研究者通过妥善汲取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思想,并适当汲取外国尤其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精义思想,再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当代世界心理学(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力图通过带有浓厚原创性的研究,逐渐建构出一批既具原创性又符合中国文化规律的心理学成果。这类论著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文化心理学能“成什么”;它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增加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深度,最终建成完全吻合中国文化特质的中国心理学,以提高中国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大家庭中的学术地位(汪凤炎,郑红,2011,pp.33-34)。三是混合型。它指兼用“发现、梳理与诠释”和“建构或创新”两种研究方式,并且运用这两种研究方式获得的成果在篇幅上大体相当。如果“发现、梳理与诠释”型研究在一本书中占绝大多数篇幅(60%以上),则归为“以

发现、梳理与诠释为主型”；假若“建构或创新”型研究在一本书中占绝大多数篇幅(60%以上),则归为“以建构或创新为主型”。

为了做到按中国文化本来面貌梳理和诠释中国文化心理学,建构符合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并能合理解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心理理论,而不是以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理论体系为参照来“筛选”或“解说”中国文化心理学,或者将一部中国文化心理学简单地写成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史,本丛书计划从“心理学+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撰写。同时,为了保证整套丛书旨趣一致与高质量,研究者制定了相应的评断标准。这个标准是:研究成果是否有助于准确描述、解释、理解或预测(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就属于中国文化心理学领域质量颇佳的论著,就可列入本丛书,否则就不能列入本丛书。

为了便于操作,在衡量某部书稿的旨趣是否合乎本丛书的要求时,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做法:一是与生活于中国文化圈的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相比较,看二者的一致性程度。如果一部心理学书稿的主体内容与生活在中国文化圈内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存在高度一致,那么,这项研究就是深入中国文化的。二是与中国文化心理学领域(扩言之,包括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学与中国社会学等领域)公认做得好的研究相比,看二者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假若一部心理学书稿的主体内容与在中国文化心理学领域公认做得好的研究成果存在高度一致,那么,这项研究就是深入中国文化的。三是与广泛流行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经典语录、格言、谚语、俚语、俗语或口头禅相比,看彼此之间的吻合程度。假若一部心理学书稿的主体内容与广泛流行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经典语录、格言、谚语、俚语、俗语或口头禅之间有较高的吻合程度,那么,这项比较研究就是深入中国文化的(汪凤炎,郑红,2011,pp. 43-44)。

在书稿的旨趣合乎本丛书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衡量其质量的高低。具体的做法是看书稿是否“新”以及“新”的程度。从性质上看,这个“新”主要包括以下六种:(1)主题新。指找到一个全新的研究主题。(2)视角新。指用新视角来提出(新)问题,审视(新)问题或研究

(新)问题,或者用新视角来诠释已有文本或材料。(3)论点新。指提出前人未见的新论点。若能提出或概括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系统新理论或系列新概念,那就属于上乘作品。(4)方法、研究范式、实验设计或研究工具新。指使用与前人不一样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实验设计或研究工具。若能提出全新且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实验设计,设计或研制出崭新的科研工具,或对原有方法、研究范式、实验设计或研究工具作大幅度的改善,那就属于上乘作品。(5)论据新。指找到前人未发现的新证据。有价值的新证据越多,作品的质量就越高。(6)结构新。指用不同于前人的结构来组织材料。碳与钻石只是结构不同,形态却天差地别,由此不难看出结构新的价值。因此,如果一篇论文或一部论著的结构越新颖,并且按此新结构组织的知识体系有利于阅读和知识的传播,其质量就越高。

从“新”的类型上看,一部书稿至少要具备这六个“新”中的一种。从“新”的程度上讲,一部书稿在初出版时,其内容较之同类著作或相关著作,至少要有50%以上的“新”;在出修订版时,至少要修订其中10%以上的篇幅;在出增订本时,至少要更新30%以上的篇幅。否则,就不值得出修订版或增订本。根据上述要求,丛书主编将针对每部书稿的具体情况,聘请专家进行匿名审读,符合要求者才列入本丛书正式出版。

本丛书正文中的引文和文末参考文献的格式基本参照APA格式呈现。同时,本丛书采取开放的体系,成熟一本出版一本。为此,从2013年开始,计划用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套丛书。丛书每出版新著作或修订已出版著作都会在书中标注已出版著作的名称和作者等信息,方便读者检索。当本丛书最后一部论著完成时,丛书就有“全家福”了。

本丛书从构思到出版,承蒙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这之中,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谢冬华先生与王佳悦女士付出了大量心血。又承蒙每部论著作者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得到了中国心理学界多位先生与同仁,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的校、院领导与诸位同事长期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帮助“中国文化心理学丛书”的学界前辈、领导、教师、同仁、朋友、同学和亲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据《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汤”指商朝的开国帝王成汤,“盘铭”指刻在商汤所用脸盆上用来警诫自己的箴言。整句箴言的意思是:假若能每天更新,就天天更新,每天不间断地更新。孔子的“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也是中国读书人的座右铭。可见,中国本有推崇创新、鼓励创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内在动力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只要我们每一位心理学研究者都能做到胸怀中国文化,并能不断锐意进取,中国的心理学事业定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空!

汪凤炎

2013年4月2日第一稿

2019年2月15日修订

于南京之日新斋

# 自序

我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出身的。我硕士和博士阶段都师从杨鑫辉先生，学的都是中国心理学史。学习和研究中国心理学史，除了让我知晓中国心理学的前世今生，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定了解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益处，就是让我看到历史上许多才俊、豪杰和枭雄的不同人生选择导致其生前与死后境况的天壤之别：有的生前风光无限好，死后却默默无闻，甚至遗臭万年；有的生前历尽坎坷，死后却美名远扬。细究其因，最根本的是：前者在世时只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却未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增进百姓福祉贡献自己的才智；后者在世时不但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增进百姓福祉殚精竭虑，而且作出了积极贡献。悟出了“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须求万世名”（语出日本近代诗人云井龙雄）这个道理后，我明白了人生的价值，知道了努力的方向，逐渐有了较好的科研心态。自1999年6月博士毕业以来，我将一部分精力用在了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将主要精力花在了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上。近二十年来，我从事中国传统心理养生思想、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和智慧心理学的研究，它们实际上都可看作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我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除了撰写并不断修订《中国文化心理学》（2004年初版，2005年第2版，2008年第3版，2013年增订本，2015年第5版）一书，尝试从宏观上逐渐建构出日渐成熟的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体系结构，在微观上则主要以心理养生、德育心理和智慧心理三个主题为切入点，从中也可看出我的兴趣点在研究中不断深化：先是童年时体弱的经历让我认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1989年9月

考入大学后通过学习心理学又发现,身体健康而心理不健康的人不但无法干好“革命”,最终甚至有可能因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而自杀。所以,《文子·下德》说得好:“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于是,我关注个体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并于2000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心理养生之道》一书。随后,我发现个体仅有健康的身心还不够,还必须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否则,一旦做出伤天害理的愚蠢之事,轻则招来牢狱之灾,重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故又开展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并于2002年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书。再往后又发现,真正健全的人除了身心健康与品德良好,还必须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否则,或易成为无用的好人,或易“聪明反被聪明误”,于是自2004年春季学期开始,我在整合前面两项研究的基础上,将智慧心理学作为研究主题,并于2014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智慧心理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一书。现在经常有人问我,当年是如何从研究中国心理学史走上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这条道路的。对于无名小卒的这种研究转向,以前我总觉得不值一提,现在想来,人世间更多的是和我一样的无名小卒,所以,完整地讲出我的心路历程,对一些初学者(尤其是冷门专业的初学者)可能有些许启迪。因此,本着“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的想法,借此篇自序,将它呈现给读者。

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考大学被视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我与当时很多来自农村的高中生一样,对大学充满了憧憬。然而实际上,我对大学一无所知,不仅从未见过真实的大学校园,更从未有人向我讲述过哪怕点滴的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我想当然地以为只要考上大学便能“鲤鱼跳龙门”,一切难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样,作为一名高三学生的我,只是偶尔会想一下能否考上大学的问题,而从未想过诸如“若考上大学了,应综合考虑哪些因素来选择自己的专业”之类的问题。1989年7月高考结束后,考生开始估分,以便填写高考志愿。我记得当时有一位热心肠且待学生极友善的老师在听到我的高考估分后,非常认真且直率地帮我分析道:“结合近几年来我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与

今年我省的高考形势,以你目前估出的分数,估计你能考上本科,但估计上不了重点。同时,鉴于师范专业属于提前录取专业,如果你报考江西师范大学,肯定会被它提前录取。考虑到你是文科生,如果你选择江西师范大学的中文或思政专业,本科毕业后很可能会回到县里的中学当一名语文或政治老师,选其他专业以此类推。在县里的中学当老师不但工资低,社会地位低,而且极其辛苦。所以,我想来想去,建议你报考江西师范大学的教育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去年(1988年)才首次招生的新专业,今年才第二届,目前还没有毕业生,估计将来你毕业后即使回来,至少也能去县教育局,这比回县里的中学要强得多。”听完这位老师满怀善意且合情合理的分析,我便毫不犹豫地在我的第一志愿上填报了江西师范大学的教育管理专业。等高考分数公布后,果如我所料,我的高考分数与我先前的估分极其接近。我顺利地考取了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管理专业,成为教育系1989级的一名大一新生。随后经过大一、大二两个学年的学习,我对教育管理专业有了初步的认识,发现该专业可以说是当时全校最不实用的专业之一。若果真学了中文、思政或历史等专业,本科毕业后至少还能到中学名正言顺地教中文、政治或历史等课程,而学了教育管理专业到中学能教什么呢?难道真能去县教育局或中学从事教育管理工作?须知,在当时的中国,很少有人将管理视作一门科学,当时的中国可能缺这缺那,唯独不缺管理干部。大三第一个学期临近期末的一个周末,我去找同专业的一位1988级的老乡学长聊天,当时他已是大四,即将毕业。我问起他的毕业分配情况,他顿时愁容满面,许久不吭声,几声长长的叹息后,他才勉强挤出一句话:“根据‘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我估计会被分回县里,但县教育局肯定是去不了的,估计会去县里的中学打杂吧。”“打杂”的意思我知道,就是“学校有哪门课没有人上,就让你去上”。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头脑中“教育管理专业是大学中最不实用的一个专业”的想法。自此之后,我便萌生了通过考研来转专业的想法,以免自己一年后也陷入学长那样的窘境。

所以,对我而言,选择考研并通过考研换一个专业,在当时实是一

种无奈选择!我下定决心准备考研大概是在1992年春季(大三第二学期),那时的高校以及如中国科学院之类的科研机构还未扩招,不但硕士点数量极少,而且硕士生导师也极少,导致全国的硕士生招生规模极小,一个高校或一个研究所的某个一级学科专业一般只有一个硕士点,一个硕士点一年只招4—5位学生,<sup>①</sup>竞争非常激烈。当时很多大学生都担心英语和政治两门课程考不过,因而不敢报考。说实在的,我也有此担心,尤其担心英语考不过,但又不想大四毕业时让自己身陷困境,希望能多一种可能的选择,只好硬着头皮上。在选择报考的学校和专业时,当时也没想太多,只是出于省钱(若要报考外省的高校,需去外省高校面试,这需要一笔路费,当时我手头拮据,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又不好意思向家里要)和便于准备以提高考中概率的想法,我报考了江西师范大学的基础心理学专业,指导教师填写了杨鑫辉教授。此前杨鑫辉先生虽从未给我上过课,我也从未见过杨鑫辉先生,不过杨鑫辉先生是当时江西师范大学的名教授之一,我早已耳闻先生的大名,故选择报考了他的硕士生。主意定下来后,我也曾想过参加考研辅导班,可是囊中羞涩,最后硬是一个考研辅导班也未上,靠自己认真复习。好在天遂人愿,当年我以总分370分且各门单科成绩与总分均过线的成绩考上了,成为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基础心理学专业1993级的一名硕士生。因杨鑫辉先生以研究中国心理学史著称,我的研究方向自然是中国心理学史。在研二的暑期,也就是1995年七八月,我有幸到江西庐山莲花洞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不但认识了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心理学家(包括杨国枢、黄光国和杨中芳三位先生),而且结识了一批来自其他知名重点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顶尖科研机构的研究生,我的视野得到了较大的拓展,也看到了自己在专业上与他们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萌生了考博的念头。恰巧1995年春,杨

①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当时只有基础心理学专业一个硕士点,1993级只招了4名硕士生。这是我考上研究生之后才知道的。2014年秋季在一次聊天时我听刘昌教授讲,1992年他考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硕士生,而当年全所只招收了5位硕士生。

鑫辉先生从江西师范大学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率先于1996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基础心理学专业面向全国招收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我也有幸于1996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成为杨鑫辉先生的首届(也是国内首届)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开始了三年的博士生学习。经过硕士和博士近五年的学习,我从原先站在中国心理学史这一心理学史分支学科的面前充满好奇,却不知从何处推门而入的状态,逐渐成长为已较系统、较熟练地掌握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知识的博士,对中国心理学史的认识逐渐系统而深刻。更重要的是,随着阅历的增加,我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今“谈史色变”的中国心理学界,若仅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限定在中国心理学史方面,将来连“生存”都会成问题。再联想到燕国材教授和杨鑫辉先生指导的中国心理学史方向的硕士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改行的状况,我进一步萌生了改变研究方向的心思。有了这一想法后,我仍在犹豫,毕竟硕士和博士阶段读的都是这个方向,有一定的底子,也有一定的感情,若不继续学习和研究它,又该以什么作为自己将来的研究方向呢?尽管当时心中纠结万分,我却不敢贸然向杨鑫辉先生提及此事,毕竟中国心理学史是他心爱的研究方向,作为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为此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当我正处于志业(杨国枢先生语)选择的困惑期时,我脑海中再次浮现1995年暑期送杨国枢先生去庐山莲花洞疗养院时他讲的一段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国枢先生。1995年暑期之前,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的胡竹菁老师到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工作,他给我带来了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即将举行的消息。随后,胡竹菁老师、童辉杰老师和我三人有幸考上了这期研讨班。当时三人中,他们二位是老师,只有我是学生(二年级的硕士生),接送杨国枢先生从南昌前往庐山莲花洞之事自然就由我来具体负责。这让我有了生平唯一一次与杨国枢先生独处几个小时的机会。我记得当时乘坐的是江西师范大学安排的一辆伏尔加牌进口小汽车。一路上,杨国枢先生精神极佳,与我一直聊到莲花洞。可惜当时没手机,